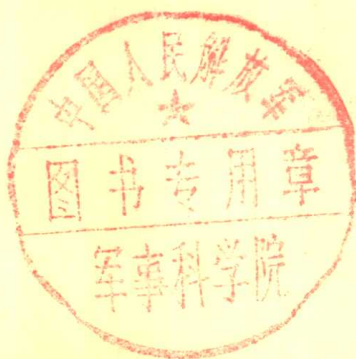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 王充的文学理论

蒋祖怡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 王充的文学理论

蒋祖怡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王充的文学理论

蒋祖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375 字数 39,000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

统一书号：10186·140 定价：0.19元

## 目 次

|                     |    |
|---------------------|----|
| 一、落寞的一生,杰出的著作 ..... | 1  |
| 二、在风雨中诞生 .....      | 8  |
| 三、在文章学术领域里的斗争 ..... | 16 |
| 四、“为世用” .....       | 26 |
| 五、“五文” .....        | 34 |
| 六、“内外表里,悉相副称” ..... | 39 |
| 七、“明言”与“务似” .....   | 44 |
| 八、“各以所禀,自为佳好” ..... | 49 |
| 九、“繁文”与“纯美” .....   | 54 |
| 十、“增”与“准况” .....    | 61 |

## 一、落寞的一生，杰出的著作

王充，字仲任，东汉初年出生于会稽郡的上虞<sup>①</sup>。

他的祖籍原来是魏郡<sup>②</sup>，祖先几代都是农民。西汉末年，遇到几个大荒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王充的世祖杀了人，不能再在那里居住，王充的祖父王汎只好挈儿带女，全家迁居到会稽郡的钱唐县<sup>③</sup>，做小商贩过日子。

王汎有两个儿子，一叫王蒙，一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蒙和王诵比他的世祖更加刚强慷慨，在钱唐县和当地一家姓丁的豪门结下了怨仇，因此只能再度迁居，到上虞县去居住。在东汉光武刘秀建武三年（公元27年），王充诞生于上虞<sup>④</sup>。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自称“细族孤门”，“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

王充幼小就很敏慧，他父亲王诵竭力设法给他读书，八岁时就能写文章，“援笔而众奇”。他年轻时到过洛阳。洛阳在当时是一个繁华的城市，书铺很

---

<sup>①</sup>今浙江上虞县境。 <sup>②</sup>魏郡，今河北省境。 <sup>③</sup>今浙江杭州市的一部分。 <sup>④</sup>见《论衡·自纪篇》。

多。王充家贫无书，就到洛阳的书铺里去坐着读书。他的记忆力很强，读过的书，都能记忆背诵。在这期间，他读了很多的书。他在洛阳的时候，还常常向当时的有名学者请教，例如班固的父亲班彪，是那时有名的宿学鸿儒，王充曾经拜他为师，向他请益。王充既博览群书，又得到名师的指点，因此，学业大进，打定了他的广博深厚的学识基础<sup>①</sup>。

王充曾经做过几任小官，《论衡·自纪篇》里说：“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功曹是负责选署功劳的工作的，职位不高。所以，他自称“贬黜抑屈，不患下位，比为县吏，无所择避。”他曾经几次被贬斥，所任也不过是州县小吏。他之所以被贬斥，据他自己讲到的，有时是为别人所诬陷。“俗材因其微过，飞条陷之。”<sup>②</sup>有时是由于他忧国爱民，愤世嫉俗，上书直言政事，为当道所不容。他有《讥俗节义》十二篇，又有《政务》一书，都是政论。他自述写作此两书的缘由道：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因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

《对作篇》里记载他还有两篇上书奏记之文，一篇是《备乏》，一篇是《禁酒》，都是针对当时政治措施而提

---

<sup>①</sup>以上记载，见范曄《后汉书·王充传》。<sup>②</sup>飞条，即匿名信之类。陷，害。

出的建议,但是没有被采用: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糜五谷,坐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①。

王充这种鲠直的处世的态度,在当时的社会里,必然会遭到“贬黜抑屈”的待遇。而他自己的生活态度,则是“位不进,亦不怀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②。他对学术研究的关心,超过了他的求仕宦之心,所以,也能安于小官,失位不恨;安于贫穷的生活,从事著述工作。他最后一次出仕,是在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那年,王充因事避难到扬州,在扬州当了一名治中从事,这时王充已经六十岁了。他在扬州住了两年,终于又罢职回家,过他贫寒的生活。在《论衡·自纪篇》里自述他晚年的生活情况道:“仕路隔绝,志穷无如”,“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这时,他的同乡谢夷吾曾经上书推荐王充,盛赞他的才学,书里是这样评价他的:

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③。

---

①建初,汉章帝年号,孟年,初年。论衡之人:指王充自己。有人认为《备乏》和《禁酒》是王充《政务》之书中的篇名。 ②见《论衡·自纪篇》。 ③见范曄《后汉书·王充传》。

但是，王充终于在落寞困顿之中病死了。他的卒年，约在东汉和帝刘肇永元九年（公元97年）到十六年（公元104年）之间。

王充一生的著作，除掉上述《政务》一书，《讥俗节义》十二篇和《备乏》、《禁酒》等上书奏记之文以外，晚年还有《养性书》十六篇<sup>①</sup>。这些书现在都已失传。《养性书》在齐梁时代可能还存在，写《文心雕龙》的刘勰在《养气篇》里还提到：“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养气篇》也可能是《养性书》里的一篇。

王充的著作中，最集中表现他的哲学、科学与文学观点的，而且在今天还保存着的，是他几乎化了一生精力从事的巨著《论衡》。

《论衡》共有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现在只有八十四篇，亡佚了《招致》一篇。王充开始写作《论衡》，是在汉明帝永平初年。永平元年（公元58年），王充只有三十二岁。《讲瑞篇》云：“此论草于永平之初”，“元和、章和之际，……此篇已成。”（元和、章和均汉章帝的年号。）可见《论衡·讲瑞篇》修改了多次。《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即是《论衡》的书名，到章帝建初年间方才确定。葛洪《抱朴子自叙》云：“王充年在耳顺，道穷望绝，惧声名之偕灭，故以《自纪》终篇。”则《论衡·自

---

<sup>①</sup>见《论衡·自纪篇》。



纪篇》的写作，是在全书最后，而王充写《自纪篇》的年龄，已经六十多岁。由此可见，《论衡》一书，王充化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尽了他一生的精力而写成的一部战斗性的巨著。《事文类聚》别集二引《抱朴子》，记载王充写《论衡》时的情形道：

王充好论说，始诡异，终有理。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sup>①</sup>。

王充为什么把他的著作名之为《论衡》呢？他在书中解释道：“《论衡》者，论之平也。”“论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定是非，辩然否。”总之，他写作《论衡》的宗旨是批判一切虚妄之言，求得道理之实。在这部著作里，论列到的问题很多，从许多自然现象到人们生活中的问题；从古书中的记载到当时的实事；从作家的评价到文章的写作，内容非常丰实。对当时“世俗之虚”的分析和批判，也很有力量。例如在《论衡》的《知实篇》里，列举了十六个具体事实以证明“圣人不能神”和“圣人不能先知”的道理。其中有一则，举《论语·先进篇》中所记载的孔子与弟子在匡的地方，因为孔子的面貌和阳货相象，匡人把他们包围起来，孔子先突围，颜渊后至的事实，他说：

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如孔子先知，当知颜渊必不触害，匡人必不加悖，见颜渊之

---

<sup>①</sup>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述略同。

来，乃知不死，未来之时，谓以为死。圣人不能先知，五也。

用《论语》中实例，证明孔子不能“先知”，进而证明一切圣人也和普通人一样，不能成“神”。这是很科学的看法，也很有说服力。但在当时竭力尊孔、把孔子神化的东汉时代，王充这样的议论，就成为惊世骇俗之谈了。后来章炳麟在他的《国故论衡》里，对王充的《论衡》评价很高，说他敢于对孔子也有所批评，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情：

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摘，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也。

韩愈有《后汉三贤赞》，认为王符的《潜夫论》，王充的《论衡》，仲长统的《昌言》，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贤之目。把王充列为后汉“三贤”之一。

相传到了东汉末年，蔡邕到会稽，读到了《论衡》，非常敬佩，就把它带回中原，秘不示人，在谈论中，时时运用王充《论衡》中的观点，当时他的朋友们都惊奇蔡邕的才学突然猛进。后来王朗做会稽太守，也看到《论衡》，叹为奇书，带回许下，也同样当做秘本，以资谈助。朋友们认为他不见异人，当得异书，搜索他的帐中，果然找出一部《论衡》来，由此，《论衡》一书，就得到推广和流传<sup>①</sup>。因为到了东汉末年，

<sup>①</sup>以上的记载，见于《后汉书》本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亦见于《事文类聚》别集二、《书抄》九八、《太平御览》六〇二，引葛洪《抱朴子》。

汉王朝已经摇摇欲坠，而对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控制，不能如东汉初年那样严紧，这时思想上、学术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放一下，所以，王充的惊世骇俗之言，就为当时所重视和欢迎了。

## 二、在风雨中诞生

王充的一生，经历了东汉四个王朝：光武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和帝刘肇。而其中很大部分的岁月是在光武的统治下度过的。从刘秀到刘肇这一个历史阶段里，也即是在王充的一生里，农民武装起义斗争，暂时处于低潮，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却异常尖锐。统治阶级竭力宣传“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用来加强和巩固他们思想精神上的统治，而当时有一些进步的文人学者，则坚持了科学的态度，和那种迷信观点作了不调和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客观上对解放人民群众的精神束缚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因而对人民群众是有利的。

汉代是科学、文学进一步昌明发展的时代，但也是迷信极其盛行的时代。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历书》，已记录了当时天文上的成就和贡献。在天文历算研究方面，亦已有著名的三家：“周髀”、“宣夜”、“浑天”。张衡的“浑天仪”，是当时天文仪器上伟大的发明。但是，也有人把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政治、祸福联系起来，把“天”当做至高无上的神秘力量，以为它隐隐地操纵着人们的命运。在当时，这种思想

集中地表现在“谶纬之说”上。而刘秀本人就是“谶纬之说”的极端信奉者和推行者。

所谓“谶纬”，又叫做“图谶”，也叫做“谶”，或者叫“纬”。种类很多，其中主要的内容，都是一些预言，有点象后来的《推背图》似的。这是后来人假造，托名为黄帝或者周公所作。或者是某一代王帝做梦看见上帝，醒来以后叫人记录下来的。从战国到秦汉，许多王帝都非常信奉它，在里边找出一言半语，以证明他们的称帝称王，乃是受命于天，不可动摇。刘秀起兵的时候，自然也用这一套老办法。当时有个公孙述，自立为蜀王，后来又称帝。据说，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公孙氏握”，这便是他称王称帝的根据。刘秀知道这件事以后，还特地写信和公孙述辩论过，说他的纬书是假的。刘秀统一天下以后，马上公布图谶，命令大家都要读这一类的书。他自己也很用心地读谶纬，有一次读得出神，受了凉，竟至昏倒。刘秀手下有个尹敏，是管理书籍的，他想借谶纬之书给自己找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偷偷地在图谶里加了两句：“君无口，为汉辅。”但是，结果却被发觉了。还有，刘秀看到谶纬之书中有那么一句“孙咸征狄”，恰巧他手下有个人叫“孙咸”的，于是马上登坛拜帅，封他为“平狄将军”。诸如此类的事情，当时是很多的。齐梁时代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正纬篇》里曾经指出纬书之不可信：

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

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擿千里①，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是则尧造绿图，昌制丹书②，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箴频见③，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

刘勰列举了四点理由，指出这种书出于伪造，很有道理。又说：

至于光武，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

汉代谶纬之说的中心是“天子受命于天，不可更易”，西汉董仲舒有《天人三策》，昌言“万物非天不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为人者天也”、“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等说法。他以为“天”以祲祥、灾异来示意于“天子”，“国家将有失道之政，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把一切人间祸福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把自然宇宙作为操纵政治、操纵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王充五十三岁的时候，章帝亲自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叫班固把这个会议的记录写下来叫《白虎通德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同谶纬迷信结合起来。此书今称《白虎通义》或《白虎通》。

---

①倍擿：犹言“背忤”。②尧造绿图，昌（周文王）制丹书：均见《尚书·纬》。其说与“孔子造纬书”相矛盾。③图箴：“纬书”之一种，相传“纬书”是解释“经书”的。

汉代还盛行“五行”之说。“五行”之说，原是我们祖先认识自然现象、解释自然现象所用的一种符号，有它积极的、唯物的意义。但到了汉代，把它作为天子受命的征兆和预言，例如汉代究竟属于“水德”、还是属于“火德”的问题，张基、公孙臣、贾谊等人就争论了好多年。我们旧的历史书里，称汉代为“炎汉”，就是受“汉为火德”说法的影响。由于把“五行”处处联系政治、政权，于是“明堂”、“封禅”、“郊祀”、“星象”、“灾异”等说法，就应运而生。这种谶纬迷信，也大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学术界。

但是在当时文人学者之中，也有不同流俗的人，他们接受科学的思想，继承了儒家的如荀子对“天”的科学看法，在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生问题等某些方面，用唯物的观点来作解释，而且还敢于说真话，坚持真理，指出谶纬迷信之说的虚妄。早于王充的有桓谭，迟于王充的有张衡。《后汉书·桓谭传》记载桓谭曾经上疏反对谶纬，还记载他因反对谶纬，几乎被杀：

（光武）帝谓谭曰：“吾欲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在今天，说没有上帝，没有天神，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王充的时代，说那样的话可很危险，会遭受杀身之祸的。

王充在《论衡》里提出他对宇宙的看法，他认为

天地无知，天地无为。在《自然篇》里，他指出，宇宙自然是没有“意志”的东西，万物自己生长，自己变化着，不是天地有意创造出来的；

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

这个结论，不是抽象的，在《论衡》一书中他曾经具体研究、分析了日、月、星、雨、雷、寒、温这一系列现象，然后得出了上边的结论。例如，在《说日篇》里他举了许多生活中的实例，证明：“夫日者天之火也，与地之火无以异也。”证明雨实际上是从地上来的，证明云、雾是“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又如在《雷虚篇》里举了五个实例，证明了“夫雷，火也”。他说，人们中雷而死的时候，须发都烧焦；经雷击的石头，颜色是红赤的，投之水中，有声如雷；人伤寒，激气，腹中雷鸣；当雷之时，有光如火；雷击的时候，房屋焚烧。因此，他说：

夫论雷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

“天人感应”说的出发点，是认为天地自然是有意志的东西，它能够左右人们的祸福，班固所记录的《白虎通·灾异篇》中就宣扬了这种观点：

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而王充却从天地无知，天地无为的根本观点出发，否定了这种“谴告”的说法。《谴告篇》里这样说：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当时，“天人感应”说的另一面，是认为“为人者天”，“圣人天生”，“圣人先知”。这无非是为帝王“受命于天”的论调制造理论根据。王充在《物势篇》里一开头就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

他认为人与万物一样，都是“自生”而不是天地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王充从“人亦物也”的论断出发，引申出两个结论：第一，既然天地不能有意识地生人，那末，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互爱。《自然篇》：

天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相爱，不当令五行之气，更相贼害。

第二，帝王将相，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道虚篇》中说：

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

在《论衡》里还有《论死》、《订鬼》、《死伪》三篇，在《论死》一篇中，举出了具体事例，反复周详地证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既然人死不能为鬼，则圣人死后，也不能为“神”。因此，他作出这样的结论道：

圣人能神乎？不能神也。

圣人既然生而不能先知，死而不能为神，那末在现实社会里，也决计没有象世俗所传说的那种“超人”。

既然“天地不能故生人”、“圣人不能先知”、“圣人不能神”，那么，一切自然现象与人事、政治，就没有什么“感应”的关系。《治期篇》里讲到“日蚀”、“月